

中国艺术研究院 学术文库

桑榆白珍集

涂武生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桑榆自珍集

涂武生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桑榆自珍集 / 涂武生著.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6.1

(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 / 王文章主编)

ISBN 978-7-5699-0732-2

I. ①桑… II. ①涂…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18172 号

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

桑榆自珍集

著 者 | 涂武生

出版人 | 田海明 杨红卫

项目统筹 | 余 玲

责任编辑 | 宋 春 丁克霞

装帧设计 | 程 慧

责任印制 | 刘 银

营销推广 | 赵秀彦

出版发行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 //www.press-mart.com](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 //www.bjsdsj.com.cn](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955 64267677

印 刷 |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0539-292588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 24.5

字 数 | 373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0732-2

定 价 | 7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文章

副主编 王能宪 田黎明 吕品田 贾磊磊

委 员 丁亚平 方 宁 方李莉 牛根富
王列生 刘 托 刘梦溪 朱乐耕
孙玉明 吴文科 吴为山 李 一
李树峰 李胜洪 李心峰 宋宝珍
欧建平 杨飞云 杨 治 杨 斌
罗 微 骆芑芑 祝东力 项 阳
资华筠 莫 言 秦华生 高显莉
贾志刚 管 峻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 出版委员会

主任 田海明

副主任 韩 进 杨红卫

委员 王训海 余 玲 杨迎会 李 强
宋 春 陈丽杰 周海燕 赵秀彦
唐元明 唐 伽 贾兴权 徐敏峰
黄 轩 曾 丽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 序

王文章

以宏阔的视野和多元的思考方式，通过学术探求，超越当代社会功利，承续传统人文精神，努力寻求新时代的文化价值和精神理想，是文化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多年以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们，正是以“推陈出新”学术使命的担当为己任，关注文化艺术发展实践，求真求实，尽可能地从揭示不同艺术门类的本体规律出发做深入的研究。正因此，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们的学术成果，才具有了独特的价值。

中国艺术研究院在曲折的发展历程中，经历聚散沉浮，但秉持学术自省、求真求实和理论创新的纯粹学术精神，是其一以贯之的主体性追求。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扎根中国艺术研究院这片学术沃土，以学术为立身之本，奉献出了《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国美术史》、《中国舞蹈发展史》、《中国话剧通史》、《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建筑艺术史》、《美学概论》等新中国奠基性的艺术史论著作。及至近年来的《中国民间美术全集》、《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中国近代戏曲史》、《中国少数民族戏曲剧种发展史》、《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中华艺术通史》、《中国先进文化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西部人文资源研究丛书》等一大批学术专著，都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近十多年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出版学术专著至少在千种以上，并发表了大量的学术

论文。处于大变革时代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们以自己的创造智慧，在时代的发展中，为我国当代的文化建设和学术发展作出了当之无愧的贡献。

为检阅、展示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们研究成果的概貌，我院特编选出版“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丛书。入选作者均为我院在职的副研究员、研究员。虽然他（她）们只是我院包括离退休学者和青年学者在内众多的研究人员中的一部分，也只是每人一本专著或自选集入编，但从整体上看，丛书基本可以从学术精神上体现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一个学术群体的自觉人文追求和学术探索的锐气，也体现了不同学者的独立研究个性和理论品格。他们的研究内容包括戏曲、音乐、美术、舞蹈、话剧、影视、摄影、建筑艺术、红学、艺术设计、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学等，几乎涵盖了文化艺术的所有门类，学者们或以新的观念与方法，对各门类艺术史论作了新的揭示与概括，或着眼现实，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对当前文化艺术发展趋向的敏锐观察与深刻洞见。丛书通过对我院近年来学术成果的检阅性、集中性展示，可以强烈感受到我院新时期以来的学术创新和学术探索，并看到我国艺术学理论前沿的许多重要成果，同时也可以代表性地勾勒出新世纪以来我国文化艺术发展及其理论研究的时代轨迹。

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我国唯一的一所集艺术研究、艺术创作、艺术教育为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性艺术学术机构，始终以学术精进为己任，以推动我国文化艺术和学术繁荣为职责。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艺术研究院改变了单一的艺术研究体制，逐步形成了艺术研究、艺术创作、艺术教育三足鼎立的发展格局，全院同志共同努力，力求把中国艺术研究院办成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艺术研究中心、艺术教育中心和国际艺术交流中心。在这样的发展格局中，我院的学术研究始终保持着生机勃勃的活力，基础性的艺术史论研究和对策性、实用性研究并行不悖。我们看到，在一大批个人的优秀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的同时，我院正陆续出版的“中国艺术学大系”、“中国艺术学博导文库·中国艺术研究院卷”，正在编撰中的“中华文化观念通论”、“昆曲艺术大典”、“中国京剧大典”等一系列集体研究成果，不仅

展现出我院作为国家级艺术研究机构的学术自觉，也充分体现出我院领军国内艺术学地位的应有学术贡献。这套“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和拟编选的本套文库离退休著名学者著述部分，正是我院多年艺术学科建设和学术积累的一个集中性展示。

多年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几代学者积淀起一种自身的学术传统，那就是勇于理论创新，秉持学术自省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以贯之的纯粹学术精神。对此，我们既可以从我院老一辈著名学者如张庚、王朝闻、郭汉城、杨荫浏、冯其庸等先生的学术生涯中深切感受，也可以从我院更多的中青年学者中看到这一点。令人十分欣喜的一个现象是我院的学者们从不固步自封，不断着眼于当代文化艺术发展的新问题，不断及时把握相关艺术领域发现的新史料、新文献，不断吸收借鉴学术演进的新观念、新方法，从而不断推出既带有学术群体共性，又体现学者在不同学术领域和不同研究方向上深度理论开掘的独特性。

在构建艺术研究、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三足鼎立的发展格局基础上，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艺术家们，在中国画、油画、书法、篆刻、雕塑、陶艺、版画及当代艺术的创作和文学创作各个方面，都以体现深厚传统和时代创新的创造性，在广阔的题材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及艺术探索的独创性等方面，都站在时代前沿的位置而起到对当代文学艺术创作的引领作用。无疑，我院在文学艺术创作领域的活跃，以及近十多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方面的开创性，都为我院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更鲜活的对象和更开阔的视域。而在我院的艺术教育方面，作为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全国首家艺术学一级学科单位，十多年来艺术教育长足发展，各专业在校学生已达近千人。教学不仅注重传授知识，注重培养学生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更注重治学境界的养成及人文和思想道德的涵养。研究生院教学相长的良好气氛，也进一步促进了我院学术研究思想的活跃。艺术创作、艺术与教育与学术研究并行，三者交融中互为促进，不断向新的高度登攀。

在新的发展时期，中国艺术研究院将不断完善发展的思路和目标，继续

培养和汇聚中国一流的学者、艺术家队伍，不断深化改革，实施无漏洞管理和效益管理，努力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知识创新、学术创新和理论创新，尊重学者、艺术家的学术创新、艺术创新精神，充分调动、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在艺术研究领域拿出更多科学的、具有独创性的、充满鲜活生命力和深刻概括力的研究成果；在艺术创作领域推出更多具有思想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具有时代标志性和代表性的精品力作；同时，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优秀青年人才，真正把中国艺术研究院办成全国一流、世界知名的艺术研究中心、艺术教育中心和国际艺术交流中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和促进我国艺术与学术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2014年8月26日

代序：无怨无悔的美学情缘

一 结缘美学感恩祖国

我从小便喜爱文艺，8岁时读小学二年级识字不多，偶然在家中发现一本母亲用来剪鞋样的破旧的插图本《水浒传》下册，一知半解地竟从头到尾读到底，由此开始迷恋和沉醉于中国古典小说。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家从鄂西恩施山区回到武汉，每天下课回家在路过“生活书店”时，一定要进门站在书架前阅读鲁迅的作品；从《狂人日记》读起，紧接着又读《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等，直到傍晚书店关门。新中国诞生后，全家移居湖北浠水小城，在这里读高中期间先后成为《新青年报》、《展望周刊》、《读者通讯》和《湖北日报》等报刊通讯员。

1952年考入长春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中文系，校长是著名历史学家吕振羽，教务长兼中文系主任为龚依群。由于这所学校的前身是“抗大”式的东北行政学院，保送的调干生很多，我在系里属于年龄最小的之一。当时经全国院校调整，从北京大学调到这所学校的有著名教授杨振声、冯文炳（废名）等，他们教我们文学理论和写作课。也许冯老师是我的老乡湖北人，对我特别亲切、关爱；他有好几次把我叫到教研室，同我单独讲解我写的作文，肯定其中的优点和一些比较好的文句，同时又指出某些错误和不足，并让我当面自己修改和纠正。我到苏联后还曾与他通信，直到他眼睛失明才中断联系。

幸运之神不知为什么总会降临，我刚入东北人民大学这一年，中苏两国签订了《关于中国公民在苏联高等学校学习之协定》，决定大规模派遣留学生到苏联，而第二年暑假学校就通知我到沈阳参加留苏预备生考试。我们一共去了20多人，结果只有8人被选中。1953年8月我们到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留苏预备班集中，主要任务有三项：一是强化俄语训练，争取达到听读讲写能力；二是接受政治考察，交代个人历史和家庭社会关系；三是锻炼身体，保证五年内能坚持学习。在前后近一年的时间里，在这里只学两门课：马列主义基础和俄语，而俄语又包括阅读和听写。至于到苏联进哪个学校和读什么专业，当时根本没有考虑也一无所知。

在乘坐前往莫斯科的火车上，从广播中才听到我们每个人将到苏联哪个学校和什么系学习。我一直认为我会学文学，但从宣读的结果中却知是分配到莫斯科大学哲学系。虽然像许多同学一样出乎意料，可并没有在思想和情绪上引起太大的波动，因为只要能出国到苏联去学习，那就是极大的荣幸和骄傲，一切服从党和国家的需要。尽管如此，我仍然恋恋不舍我的文艺爱好；当进校后知道哲学系有唯一与文学艺术有密切关系的美学专业时，毫不犹豫地便选择了它。这个决定经我国驻苏联大使馆同意并批准后，我和另一位同学杨汉池（后来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便成为共和国派往国外最早的两名攻读美学专业的留学生，美学的情缘由此而来并终生不悔。在离开满洲里的中苏边境线上，我们向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举手敬礼，心中不断地宣誓般重复说：祖国母亲，请您放心，您的嘱托，铭记终生！

二 苏联教授美学启蒙

在苏联莫斯科大学的5年学习生活，使我真正跨入到神圣的美学殿堂。青春的年华，阳光明媚、充满活力；每时每刻，离不开书本。除了上课听讲，每天清晨起床早餐后，便一头钻进图书馆，直到深夜11时左右才回到宿舍。莫斯科列宁图书馆、苏联科学院图书馆、莫斯科大学山下和列宁山上的图书

馆，都是我们经常出入的场所。下课后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与同学们一道，到高尔基大街逛书店。新书店、旧书店、外文书店、专业书店，几乎家家都要光顾；书架上展示的各种版本、不同文字的大小书籍报刊，形形色色、琳琅满目；有时发现一本喜爱的书刊，如获至宝、如饥似渴，迫不及待地立刻买回细读收藏。我至今仍保存一部1940年由苏联国家社会—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俄文版黑格尔的《美学》，如今在俄罗斯也成为珍本。

莫斯科大学是苏联最著名的高等学府，历来是著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开始几年哲学系在红场附近，我们通常都是先乘无轨电车再乘地铁赶到学校。每周的课程最初是6天，后来改为5天，每天都排得满满的；有大课也有小课，除必修课外，其他课任学生挑选。与我国的学校不同，这里没有8小时工作制，也没有固定的就餐时间。课程多时，从早上7点半一直到晚上9点半都要接着上课；只有课间的15分钟休息。吃不上午饭是家常便饭，用几片面包和一杯饮料替代，晚餐有时便变成夜宵。但从未听说过大家有任何怨言，因为专心听课努力学习对我们不是负担，而是每个出国学子的自觉需要和兴趣。我们如饥似渴、争分夺秒，在课堂上听教授们讲美学，总是早早地去抢占前几排座位，以免漏听重要的亮点和内容。

阿斯穆斯是给我们上西方美学史的老教授，那时已年过花甲。他满头白发，精神抖擞，刚跨上讲坛便滔滔不绝、口若悬河。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已经是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知名教授，并且编辑、翻译了有权威性的《古希腊罗马思想家论艺术》一书，这是苏联高等院校美学专业学生必读著作之一。他精通希腊语、拉丁语、德语、法语、英语等七八种语言，学识渊博、见多识广，据说在天文学方面也是数一数二的专家。讲课时他不爱照着讲稿念，通常只带一份提纲，有时再多带几本书。书大多是原文版，边讲边随意翻开念一段，然后让学生们课下找来读。他不硬性规定听讲人做笔记，只要把握要点真正理解就行。听他讲课很费劲，必须在课前、课后将指定的原著先读过再复习才能适应。康德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起先我阅读中文译本如同看天书，不知所云。经他在课堂上讲过几次，

前前后后，豁然贯通，读俄文译本也不觉得那么难，口试时有的段落居然能用俄语背下来。

比阿斯穆斯小两岁的另一位著名教授顿尼克，在我出生那一年已是莫斯科大学教授，20世纪50年代已成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在我的印象里，那时他在国内外的知名度似乎超过阿斯穆斯（从1943年开始，每年苏联科学院院士选举，阿斯穆斯都被提名，可由于他的“历史问题”一再落选）。《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一版的《美学》条目，就出于他的手笔。我国在20世纪40年代，翻译并出版过他的《美学的基本问题》，50年代又出版过《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列宁格勒大学美学教授卡冈曾经说：登尼克发表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美学文章，是“对30年代苏维埃美学科学积极发展的结果进行了总结”。他同样精通多种语言，有一次课间休息时还问我，中文的每个字看上去好像是一幅画，到底如何才能学好。对西方哲学史上的经典著作，他熟门熟路、了如指掌。讲课时一字一句、铿锵有力，抑扬顿挫、逻辑性强。考试时他特别看重是否读过原著，有时让学生先背某部书的目录，然后再谈心得体会；背不下来就请回去从头至尾再读一遍，过几天再来补考。

当阿斯穆斯和顿尼克已成为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授时，奥符相尼柯夫仍是系里的研究生。50年代他给我们讲授“现代资产阶级美学”课，还是副教授和副教授，刚刚进入不惑之年。每次讲课前他都准备了比较完整的讲稿，有的还油印出来供学生备用。但在课堂上却不照本宣科，而是以讲稿为提要补充大量的有关资料来印证和说明。听他讲课比较轻松，但要专心致志，不然就会漏掉一些重要的信息。奥符相尼柯夫博古通今、著作等身，既对俄罗斯和西方古典美学思想有相当系统的了解和研究，又及时关心和非常熟悉国内外的美学动态。他的著作中有大量的对西方现当代美学思潮的批判，可从不反对学生们去接触和阅读这些书刊。在和我们的交谈中，他常常说：要先掌握第一手材料，然后才能真正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去分析、批判，不能先入为主、凭空想象。学生们向他诉苦，说指定的参考书实在太多，来不及阅读。他毫不犹豫地笑着回答：书读得越多越

好，不要怕书；有的书精读，有的读个大概；有的可以当枕头，有的只能垫脚，有的看完就扔掉！

教我们“美学原理”课的老师叫斯卡捷尔希科夫，他比奥符相尼柯夫的年纪还要小。那时，他既是莫斯科大学的哲学副博士，又是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副教授。可能是年龄的关系，与学生们相处得最融洽、最随和的老师就数他。在同学们的眼里，他年富力强、年轻有为，举止潇洒、风流倜傥。上他的课是最活跃、最热闹、最不受拘束的；往往是他在台上眉飞色舞、谈笑风生，台下则兴致勃勃、交头接耳，不时被他讲的趣闻逸事、插科打诨引得哄堂大笑。讲课开始时，他总爱问大家最近看过什么戏或电影、电视节目，听过什么音乐会，参观过什么展览馆、博物馆，读过什么新诗、新小说，然后让大家发表意见、交换看法。莫斯科大学旧校舍位于市中心莫霍瓦亚大街跑马场附近，那里新建了一座大展览厅，经常有美术和其他展览。有几次他就把课堂干脆搬到那里，边看边讲边议论。他还乐意同学生一起到剧院、音乐厅、电影院去欣赏节目，回来后集体讨论、分析、研究。他的教学原则是：美学理论与艺术实践密切结合，书本知识重在运用。

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福明娜教授，1906年生，1951年成为莫斯科大学哲学博士，是著名的俄罗斯美学思想史，特别是普列汉诺夫研究专家。她像母亲对待儿女般爱护和关怀中国留学生，细心照料、体贴入微。我们对俄罗斯美学历史异常陌生，即使是苏联同学对当时一些加盟共和国少数民族思想家的美学思想，过去也很少接触。因此，她讲的那些美学古典著作，常常名字都记不住，听她的课真是“目所未见、耳所未闻”，迷雾重重、一筹莫展，百思不得其解。她耐心地安排我们课外抄苏联同学的笔记，再细读一些原著，按年代梳理、综合，慢慢才进入状态。我的选题本来属于理论范围，不知为什么却指定由她担任指导老师。她专门给我开了一张书单，让我先读有关的美学和文艺理论论著；再教我拟一个大纲，确定主要论点和论据，经她修改后再动笔。那是我用俄文撰写的第一篇长文，语言文法有不少错误。她不仅一字一句地细心修改，帮我润色，还向我详细解释错在何处，为什么要

这样改。有的地方，等于重写。这篇论文以优秀成绩顺利通过答辩，实在归功于她。

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的课程很多，除了以上的美学专业课，5年内还要通过20多门课的考试、考查。它们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联共党史”、“外国哲学史”、“苏联人民哲学史”、“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学”、“宗教和无神论史”、“逻辑学”、“心理学”、“教育学”、“高等数学”、“普通物理学”、“理论物理学”、“生物学原理”、“近代和当代史”、“哲学课程教学法”、“文化工作基础”、“第二外语”、“体育”，等等。另外，还有一门“军训”；因为按照苏联当时的规定，未服兵役的大学生，一律要在学校通过军事训练课程。刚进哲学系时，校方原准备安排我们入学后第一年先学俄语，然后再去听课。可大家为了节省国家的费用开支，没有同意，坚持用5年时间学完全部课程，并且人人都取得优良成绩。以上这些课目的内容，有的在考试、考核通过后，就几乎忘得一干二净；可它们扩大了我们的眼界和拓宽了知识结构，我们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本功，对美学的基础训练还是相当必要和有用的，终生受益匪浅。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回国后，再也没有这样难得的系统学习的机会。

三 拳拳之忱刻骨铭心

1959年7月，我们告别莫斯科回到祖国，在北京外国语学院集中学习和等待分配。抵达北京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的新华社电讯稿的标题是：《祖国建设战线又添新军——400多名留苏学生学成回国》。随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真、李富春、聂荣臻、陈毅、郭沫若、周扬、杨献珍、杨秀峰等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我们，并一起合影，我至今仍保存着这张珍贵的照片。过了几天，我们又有幸参加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国庆10周年的盛典。随后，当宣布我和在莫斯科大学同班一同学习美学的同学杨汉池两

人，都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时，我又惊又喜；想不到经过6年多的岁月流逝，从东北人民大学中文系到国外学哲学，又转回国内到文学研究所研究美学。多年后我才知道，我俩调入文学所工作，是与何其芳、蔡仪的争取分不开的。那时国内的美学大讨论仍在持续，他们向周扬提出，希望加强文学研究所的美学研究，调进一些美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充实文学所的力量。周扬对这个要求相当重视，于是向有关方面建议，将我俩选派到文学研究所。

50年代初成立的中国科学院（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不愧为国内一流的声名显赫的最高文学研究机构，所内除了有过去在延安生活和工作过的一大批老艺术家，如何其芳、毛星、贾芝、力扬、曹葆华、卞之琳、路坎、陈涌、井岩盾、王燎荧、朱寨等，还有像俞平伯、钱锺书、陈翔鹤、王淑明、孙楷第、王伯祥、余冠英、李健吾、杨季康、唐弢、陈友琴、潘家洵、罗念生、缪朗山、戈宝权、叶水夫、张白山等党内外著名学者，他们的论著和作品不少都是我读过和喜爱的。协助何其芳管行政事务的副所长，则是黄克诚的夫人唐棣华；而文艺理论组组长蔡仪更是我早就仰慕的美学家。这些前辈们几乎个个“学富五车，书通二酉”，著作等身、德高望重。

文学研究所的所长何其芳，那时正密切关注我国学术界开展的美学大讨论，对我俩抱有很大期望。记得刚到所里报到时，他就笑眯眯地对我们说：你们是祖国派往苏联的头一批美学留学生，在莫斯科大学学习了5年，肯定是有不少收获的。国内目前还没有这么优越的条件，美学研究才刚刚起步，很需要有扎实的美学功底的科研人员。蔡仪同志是所内唯一专门研究美学的专家，是国内美学界一派的代表，你们就到理论组与他一起工作吧！接着他又补充说：现在我们只有哲学研究所设有专门的美学组，文学所是由蔡仪负责的理论组研究美学，这样也有好处。美学研究要联系实际，结合实际，要多研究一些现实生活中和文学艺术中存在的问题；抽象的理论问题也要研究，比如美的定义、美和美感的关系、什么是艺术美等一大堆理论问题都值得研究。但是不能总是从概念到概念，从定义到定义，从理论到理论，总得

关心一般人感兴趣的许多美学问题。即使讨论的问题是很抽象的，也要通过一些具体的论证，用一些实际的生动的例子来深入浅出地说明。否则，圈子会越来越窄，路子会越来越死。文学艺术是离不开美的，我们不是唯美主义者，可思想内容好却吸引不了人、打动不了人的作品，为什么不受欢迎呢？仅仅只有内容好的诗，就不一定是好诗。这里就有一个艺术美的问题，美学问题。因此，你们到文学所来工作，不是没有作为，或者只是小有作为，而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呢！我们不能不为他的真诚和热情所打动，不仅连连点头称是，还从心底里感受到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对后学的拳拳之忱！

然而，当我们特许休假一月回乡探亲，再到文学所上班时，气氛却完全改变了。在建国门内5号院“六号楼”里大会议室内，挂满了党内整风反右倾的大字报。庐山会议的文件，回国集中学习时便听过传达，并且还结合自己的思想学习和讨论过。但这次运动竟然与文学所挂上了钩，而且一开始就如同暴风骤雨，铺天盖地地冲击着这个学术研究机构，那是做梦也未想到的。原来，作为副所长的黄克诚夫人唐棣华，尽管她在北京家中，对庐山会议一无所知，但仍然被确定为重点批判对象，上面要她揭发、交代与“反党集团”的关系，彻底划清界限。不仅如此，由于文学所有唐棣华，属于领导成员的党员干部，也都成为重点检查批判的对象。只是与唐棣华稍有不同，何其芳、毛星和蔡仪三位所内的党员理论家，重点是对照检查自己的学术思想，并号召全所的党员干部（后来又扩大到全所工作人员），一起来系统地揭发批判。因为我和杨汉池俩人的专业是美学，于是整风领导小组便布置我俩分工查阅蔡仪的所有论著，找出问题，写大字报，整理批判稿，准备在支部大会上作重点发言。

这是我走向社会参加工作后，接受党组织交付的第一项任务，也是第一次真正参加国内的政治运动。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夜以继日、认认真真地读完了蔡仪的《新艺术论》、《新美学》和《唯心主义美学批判集》等著作，然后又绞尽脑汁、花尽心思，细挑和历数其中的“错误”和“问题”，炮